

时空片断



黄胄手不离笔

与黄胄先生相识是在1963年。当时海军部队开画展,由于我有参展作品,便到了北京,并有幸结识了他。彼时我才二十出头,黄胄大我15岁。

当时黄胄先生还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创作员。由于不用坐班,白天我便经常去他家里学习。他的家在羊坊店,极普通的公房,印象中是二楼。

进门的墙上挂着陈伯达书写的丈二匹的四个大字“道法自然”,把这堵墙塞得满满的。一位出色的画家,天赋与勤奋缺一不可。黄胄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勤奋。我曾开玩笑说,他除了睡觉之外,手里永远离不开竹子,吃饭时是一双筷子,其余的时间是抓着一支毛笔。

手不离笔,是他日常的状态。无论什么朋友来看望他,甚至是他的长辈画家、领导来看望他,他都只愿画画,头也不抬,只是说:“你好啊!来啦!从不放下画笔,更不起身倒茶。”解放初,二十出头的黄胄先生从新疆调到了北京,向时任中央美院院长的徐悲鸿先生提出了去美院学习的想法。然而,徐悲鸿先生敏锐地看到了黄胄超人的天分,对这个画坛晚辈已经形成的风格暗自欣赏,而学院派的条条框框或许会限制了他的艺术创作,便善意地婉拒了他。(据《文汇报》韩天衡文)

历史散叶



康熙与 蒙古台站

康熙帝亲政后,励精图治,经常读书和批改奏章到深夜而不知疲倦,也渐渐施展出他的才能:平定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;取得雅克萨之战的胜利,与沙俄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;击败盘踞在天山南北的蒙古准噶尔部的噶尔丹,并趁机使外蒙古喀尔喀部全部归附。清朝特别重视与蒙古诸部的关系,因为满清之所以能够入关,主要依靠的就是满蒙联盟,康熙帝就曾洋洋自得地说:“历朝历代都修长城,但是修了也守不住,我朝对蒙古诸部施恩,这比长城还坚固啊!”随着清政府在蒙古地区的编旗设佐,驿站也建立起来。驿站系统不但是清政府对蒙古地区权力渗透的主要通道,也是蒙古各旗王公入京朝觐和商旅往来的主要道路。

康熙帝谕令在内蒙古一带设立五路驿站,即喜峰口外设立15站,古北口外设6站;独石口外设6站,张家口外设8站,杀虎口外设12站。每站安丁五十名,量给与马匹牛羊。这五路驿站也被称为“蒙古台站”。(据《环球人物》吕文利文)

焉”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力。你当时问我有什么法子,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。我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,这条新路就是民主,就是让人民来监督政府,政府才不敢松懈。只有人人起来负责,才不会人亡政息。

毛泽东勉励大家道:“今天,我们聚会在‘民主之家’,今后,我们共同努力,生活在‘民主之国’。接着,他反复强调‘和为贵’,恳切表达了对和谈的冀望。

张澜的应诺

9月15日下午,毛泽东拨冗三访张澜到特园。张澜、鲜英欣喜地将毛泽东再次迎引入张澜卧室,三人才坐定,张澜双眉一皱,迫不及待地问道:“润之先生,展望谈判,终将如何?”

毛泽东说道:“表老,这里我要告诉您一件事,他们正在美国支持下大力运兵,名为接收,实则准备内战。”

张澜惊怒道:“此事先前虽有所闻,尚未能全信,今日看来,确然无疑了!如若果真时局发展到这不可逆转之境,地而被迫一战,敢问前途如何?”

“广大人民是和我们在一起的,这是我们的事业,必然取得胜利的保证。毛泽东满怀信心地回答道,“我们有坚强的党,有从事人民战争的军队,有具有威力的统一战线,这是我们藉以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。当然困难是有的,但前途是光明的。”

沉默片刻后,张澜提了一个重大问题:“润之先生,内战到了不可避免之日,四川该怎么办?”

表老,我今天主要就为这件事来的。四川支持八年抗战,蒋氏在这里有一定势力,他还都南京后,对此岂肯放手?毛泽东沉思片刻,忽一昂首,举起厚实的大手,竖起两个指头,亲切而又诚恳道:“表老,如内战不可避免,我谨代表中共郑重拜托两件大事:第一件大事,请你以你之威望,影响地方实力派与我党通力合作;第二件大事,请你协助我地下党发展武装,组织游击队。日前,我跟恩来商量决定,派贾子群等在南充组织川北民主联军,打通华蓥山、大巴山、伏牛山至五台山,开辟一条连接四川与华北解放区的地下通道。表老,这就要请你大力协助了。我当尽力为之,不负君命!”张澜一口应诺。(据《世纪风采》)

同时,顾颉刚的学术性格喜欢收拢兵丁,聚合相关学人共举其成。好处是各职其事,各司其责,坏处是协调不好,便使头绪太繁,手忙脚乱,顾此失彼。所以然者,乃在顾颉刚“好定计划,好向强处走,好拼命办一件事,以至于此也。弟之为人,不办事,不教书,则可,少办事,少教书,则不可,盖生性贪多务博,好大喜功,无论什么事情,一经着手,立刻会有野心,希望得到最高的成绩,而且一着手就是‘最大最好’之计划,于是使得他‘永永不能有满足之时,而事情亦永永做不完’,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‘开局甚好,收尾实难’,总有遗憾。从他一生的行迹看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他实在是一少见的‘爱学乐学’的学术人。”

说他为少有的学术人,是他一生之大愿,日常生活,都与学术和读书紧密连在一起。从他每日所记最终达数百万字的日记、十五卷读书笔记以及大量文稿看,他几乎天天在读书,简直骇人!这种勤奋与毅力实属罕见,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。

总括来说,顾颉刚想做名实相符的学阀,以扎扎实实的工作求真实的名声,在宏大而厚实的学术事业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。实际上,顾也做到了,他在学术领域成功地开疆拓土,无奈他贪多贪大的性格既成全了他勃勃的学术雄心,也一定程度毁了他。许地山称顾为“学术上的多妻主义者”,虽为戏言也是实情。他也知道自己的特性,曾书一条幅“好大喜功,永为怨府,贪多务得,何有闲时”,以自戒,只是性格使然,改不了了。

(据《随笔》)

里,各界人士共商国是、聚会、宴请也常在这里,贵党董必武先生乃赠此徽号。冯玉祥将军间来作客,听到这名称后,欣然命笔写了这块匾。郭沫若先生还为之题诗呢。毛泽东笑道:“原来这是董老题的名,还有郭沫若先生的诗,那加上冯将军的书法,也堪称三绝了。毛泽东的话引得主、客彼此相视大笑。”

四人在笑声中坐定,张澜关切地问:“润之先生,您看此次谈判前途究竟将如何?”毛泽东向张澜讲述了中共和平建国之主张,以及向蒋介石提出的“谈判十一条”,大意是承认解放区的民主政府和抗日军队,划定八路军、新四军、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,严惩汉奸,解散伪军,以及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,保障人民的自由权利,等等。

毛泽东三顾特园访张澜

孟 骥

张澜认真仔细地听完,便连声称赞,感佩道:“润之先生,此次您竟会来重庆,是我们意想不到的!您现在来了,我们又不能不为您个人安危而忧虑啊!”

毛泽东神情坦荡,悠然一笑:“此次来之前,我们是作了充分研究和估计的,按目前形势看来,可说有惊无险,或者是有险不危。我现在不是甚好吗?毫发无损,我一下飞机,也没有把我扣留起来嘛!我是诸葛亮到东吴,身在虎口,安如泰山啊!张澜从毛泽东的眼神里体察到了这位中共领袖的处危若安、宁静致远的胆魄。”

今日聚在“民主之家”,日后生活在“民主之国”

9月2日中午,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,在特园宴请毛泽东、周恩来和王若飞。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、黄炎培、鲜英、张申府、左舜生等做东欢迎招待。席间,67岁的黄炎培把酒临风,笑问毛泽东:“今年7月,我与褚辅成等先生赴延,曾与毛先生畅谈国事,其中愚弟几句狂妄之语,先生还曾记否?”

“何曾敢于忘怀!先生所言:‘一人、一家、一团体、一地方、乃至一国’,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所谓‘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

学阀 顾颉刚

朱洪涛

不致成他们之眼中钉,而得专心致志到学问上,成就我理想中的著作。故卖身其名,超然其实。顾有此体认,是他对当时北平学界有一整体观察,即认为此时在学界若无人引荐,青年学子很难打入进去。学界已经山头林立,板结固化了。因此他想打破这种局势,做积极意义的学阀。

顾颉刚想做积极意义的学阀,这与他的学术理想与性格有莫大之关系。其实说来,顾心目中的学阀概念是一褒义词,不是为己,乃为公。顾以为做学问与征战一样,将帅、兵丁都是需要的,二者互相配合,才能发挥最大的功效,兵丁要能做,但更要有做将帅的野心。顾说研究学问的人如果没有做领袖的野心,这样的人是没有出息的,他决不会有独特的成绩。但如果单单只有做领袖的野心,而不肯切切实实下苦功,那则更没出息,因为这样的人从此只会“奔走联络,抢地盘,包而不办,排挤人才,陷害青年,做人群的蠢贼了”。顾颉刚觉得要决绝舍弃做包而不办之领袖的野心,应当刻苦地工作,使得后世的人承认你是一个“真实的领袖”,而非空有其名。

1945年8月,在日本宣布投降,抗战胜利后仅两个星期之内,蒋介石接连三次发电报到延安,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商谈国是,毛泽东为争取和平,毅然决然地飞赴重庆与蒋进行谈判。

8月28日下午,一架绿色军用飞机稳稳地停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跑道上。机舱打开,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第一个出现在舱门口。在迎接的人群中,毛泽东认出了蓄着飘飘银须的张澜,便笑容满面地走上前去,热情地伸出厚实的大手。张澜是四川南充人,清末秀才,中国民主革命家,时为“中国民主同盟”中央主席。

重庆谈判从开始至最后达成协议历时43天。这43天,毛泽东就一直为国事奔波于谈判会、茶话会、宴会,不亦忙乎!

初聚“民主之家”

8月30日,送走前来红岩村拜访的郭沫若夫妇后,毛泽东决定和周恩来一道驱车特园,拜访住在那儿的为人所敬重的这位张表老(因张澜字表方,时人皆敬称其为表老)。

特园园名来自园主鲜英,鲜英字特生,早年曾入四川陆军速成学堂学军事,后一直紧随张澜共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殚精竭虑。抗战时期,鲜英常年居家于特园,对来重庆的社会各界人士热情招待,使特园成为国民参政会历届参政员聚首共商国是的场所。

那一天,在毛泽东来园之前,周恩来已派人来关照,为安全起见,我们不坐客厅,就在表老卧室谈话。原来,这特园早为国民党特务所忌恨,并对它进行严密监视。下午3点,汽车在特园门口停下,张澜和鲜英早已伫立在门口迎候了。随即就将贵客迎入特园,四人边走边谈,不觉来到二门口,毛泽东忽然站定身躯,仰首观看门额上一块匾(此匾现存于红岩革命纪念馆),只见上书“民主之家”四个大字,不禁对着它口中喃喃:“民主之家,民主之家,这里确是一个民主之家啊!又觉得这一笔隶书,清劲秀逸,再看落款处,豁然入目,乃是冯玉祥之大名,便笑对张澜道:“冯将军行伍出身,能写得这样一笔好字,不简单啊!既武既文,亦俗亦雅,不虚儒将风范。此公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了。张澜笑道:“是啊,冯将军也是我们民盟的知己。鲜英接着介绍道:“毛先生,因为表老住在这里,民盟总部亦设在这

1929年,顾颉刚因不满中山大学的人事、学术环境,决定北上就任燕京大学教职。他没有选择北京大学,清华大学是怕熟人太多,攻讦太甚,担心无法安心问学,燕大以其环境清幽、人事关系简单、自由度大,顾认为是治学佳地。1928年2月26日,顾颉刚曾给燕大史学系容庚信提出了七项要求,此缜密之具体要求一看就知是详细思考的结果,可窥见顾的择校择业之由:

(1)不引进政客,免致机关本身受政治摇撼。(2)不引进复古派,免致学术不能照了轨道走。(3)不引进学阀,免致学术机关为其私人垄断,且为排击敌派之根据地。(4)不引进文人,免致机关腐化,致同事不勤业务。(5)不引进平庸人,免致发表刊物为讲义式之文字。(6)不引进头脑不清之人,免闹意见。(7)不引进爱发议论而不负责任之人,免致团体分裂。

七条要求都以研究学术为本。顾的学术理想是建立一学术共同体,不掺杂学术之外的其他因素,单纯而全身心为学。尤其是第三条,顾说不引进“学阀”,此处的学阀在顾的脑海中完全是一负面词汇,为培植私人、党同伐异的代名词,顾相当反感这种消极意义的学阀。何况他亦体会过此种学阀之苦,他曾与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信,表明不往清华大学任教,是怕“招尤纳侮”,并进一步谈为何选择燕京大学:“如果弟当时应聘,则此一年中,不是由他们离间,使我二人不睦,即是由他们造谣,拟弟子兄之走狗死党。此乃必至之局,非弟之神经过敏。弟之所以宁愿卖身于教会学校,正欲与这辈活动人物断绝关系,使弟